

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

苏云，是陶行知为她取的名字，寓意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朵云。作为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仅12天，而关于母亲的记忆更近乎一片空白。“偶尔想起来也会有些感伤，但是那个年代又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遭遇。”爽朗的项苏云轻轻一挥手，似乎不愿让自己陷入到那种情绪中。

父亲项英牺牲60多年了，项苏云愿意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军的各种研讨会。“我对父亲的了解不多，我不愿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加辩论。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会接受历史的评价。”今年77岁的项苏云已经看淡了很多。



项英与女儿项苏云(右)、儿子项学诚唯一的合影，摄于1938年

漂泊的云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候我只有两岁，我不知道我的爸爸是新四军军长项英。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31年出生，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别人，自己离开上海去苏区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农业部部长王观澜的夫人)，她说她在上海时帮妈妈带过我，妈妈离开后，她把我带到了浙江，把我交给在浙江的地下党员林迪生(注：前兰州大学校长)。可是大家也没办法养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儿院里。那些阿姨们说，我的小名可能叫阿苗，我的弟弟项学诚小名叫阿毛，还有一个在苏区下落不明的弟弟叫阿狗。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办了一个新安小学，新安小学一位叫郭青的老师到上海来办事，陶先生便让郭老师把我带到新安小学。郭老师问：“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下说：“叫苏云吧，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片云。”从此我便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张苏云。我也不知道陶先生为什么让我姓张，可能觉得张姓比较普遍吧，“项”还是太引人注目一些。

现在回想，陶先生应该是知道我身份的。我记得陶先生很郑重地嘱咐郭老师：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好。好景不长，不久抗战爆发，日本人很快占领了徐州。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写信告诉郭青老师：形势很紧张，你带着张苏云去西安吧——除了我之外，学校还有一名孤儿，但汪校长只让郭青老师带我一个人走。我想陶先生应该跟汪校长交待过我的身份。

12天的父女

我从小到大就习惯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在延安能见到爸爸，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了，说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见他。记忆中我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

爸爸在武汉搞工运时有一位战友叫林育英，革命时期化名张浩。张浩派警卫员把我，还有张浩的两个儿子带到延安城里一个院子的一间平房。见我们来了，张浩伯伯一一做了

介绍：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着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刘爸爸(刘少奇)，怀里抱的孩子是刘爸爸的女儿刘爱琴。张浩告诉我，等一会儿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爸爸的欢迎会。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7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于是爸爸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

直到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4岁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拼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没法休息，又把他送回了保育院。

记忆中爸爸对我很好，白天他去开会、工作，晚上接我回来，早上送我上学，有空时还给我洗脸、洗头、洗衣服。有一天，爸爸请郭青老师吃饭，我记得爸爸亲自给郭青老师斟上了酒，但我却把郭老师的酒杯抢了下来说：“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两个大人相视而笑。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与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去延安时送给我的。爸爸在里面笑得特别开心，后来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爸爸特别高兴，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纪50年代去邓妈妈那里看到这张照片的，邓妈妈赠给了我。

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就要离开延安，所以他白天来学校，想再来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还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

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很多新四军的人到延安来，都会到学校来看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到延安看到我时说：“有这样一对儿女，

项军长可满意了！”很多年后我去拜访陈丕显伯伯，他还特地把夫人喊过来见我，原来爸爸告诉陈伯伯说，我长得很像陈伯伯。陈伯伯当然长得比我漂亮。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直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没什么直接印象，但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央对项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可惜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他手。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后，藏身在一个山洞里，就是父亲身边的人回忆，父亲在山上时还很痛心，觉得新四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有很大责任，决定出来后先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刘厚总，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刘厚总在凌晨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父亲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又抢走了手表和枪支，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刘厚总并不是电视剧《新四军》里描述的那样，是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的秘书顾雪卿回忆，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起的。刘厚总个子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所以当

他要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也很自然地答应下来。父亲带着几个人突围出来后，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情绪低落，一直念叨着“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可怜父亲英雄一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项英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突围出来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在苏联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我们相视一笑。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看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相对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篇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视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

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母亲之谜

1938年，郭青老师把我带到延安时，我听说妈妈就在一个月前刚刚到过延安，把弟弟留下来后离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也错过了跟妈妈见面的机会。

母亲后来的命运多少与瞿秋白有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万多人被敌人包围。当时重病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已怀孕的母亲与中央苏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周月林一起撤离，突围时，何叔衡牺牲，瞿秋白、周月林与母亲一道在福建被俘。被俘时，母亲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3年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监狱的牢房里。但就在母亲和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也快要获得自由时，国民党却突然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杀害了他。

化名为“林琪祥”的瞿秋白为什么会暴露身份？很长时间一直是个谜。最近几年，一些正式出版物上还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说我母亲入狱后找到了父亲项英，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和你与周月林有关系？父亲看母亲显得很紧张，就认为是母亲出卖了瞿秋白，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把母亲枪毙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但这完全是个谣言。

为了写父亲的传记，军事科学院的王辅一找到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李德和回忆1938年2月至3月间，项英在南昌着手编组新四军时，母亲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同张亮会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谈了个把钟头，他们讲些什么不知道，声音时高时低，项英态度严肃，但根本没发生枪毙张亮的事。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就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未与张亮见过面。

王辅一也走访过原新四军秘书长、后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张亮找到项英时，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俘去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我猜想，父亲大约是在质问母亲：瞿秋白被杀害了，你为什么能活着出来？肯定也对母亲有所怀疑。

事后证明，离开南昌后，坚强的母亲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是原延安市妇联主任，当年妈妈送弟弟去延安时，她直接接过我妈妈，所以“项英杀妻”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也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抓到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与瞿秋白同时被捕，知道瞿秋白身份的周月林与母亲张亮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周月林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曾被派到苏联学习过，与海参崴华工工作负责人梁柏台结

婚，1931年经请求获准与梁柏台回国工作，把一双儿女留在了苏联，后来也下落不明。1934年，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17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且是主席团中的唯一女性。她曾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从资历上讲，还是邓颖超的上级。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因为周月林懂医，所以留下来护送瞿秋白。周月林被捕后，被判刑10年，关押于龙岩监狱，1938年经人保释出狱。周月林后来辗转回到上海，解放后，担任街道普通干部。好日子没过几天，瞿秋白专案组成立后，周月林在1955年被逮捕，被送到秦城监狱改造，1965年又被判刑12年，送到山西的工厂劳改，吃尽了苦头。

周月林一直没停过申诉，直到若干年后，有人在当年国民党的一份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原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1979年，周月林获得平反。平反后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县度过余生。1997年，91岁的周月林在新昌县去世。

周月林的晚年还算安定，新昌县对她很好，还有人专门采访她，给她写了传记。周月林也回忆说，张亮出狱后告诉她，自己要去江西找项英。写传记的人把书寄给了我，可惜等我看到这些材料时，还来得及找周月林，一年后她就去世了。

妈妈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7岁那年爸爸来延安看我时，我曾问过他：“妈妈在哪里？”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妈妈不在了。”然后什么都不再说了。围围的大人也很少提我妈妈的事。我的婆婆涂俊明也是一个老革命，偶尔她会对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很漂亮，比你漂亮。”

很多年里，我也根本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子。“文革”时期，我去上海参观，住在我丈夫的朋友家里。有一天，朋友的一位友人来拜访，看见了我，忽然说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是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要来的。他给我翻印了一张，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从照片上看，妈妈的确漂亮，我也只有下巴这里像妈妈。但是看到照片，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对于母爱，我没有得到过，所以也没有失去的痛苦。

关于母亲的下落，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最新说法。去年底，一个记者去访问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过，在康生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找人审查，这位老人家审查的男的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她出卖了瞿秋白。这件事情之后，他也险些被康生以某种借口除掉，但这些老干部是罗瑞卿的部下，是他托人找到罗瑞卿才保住性命的。等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我再让他们带我去见这个老人时，老人家已经糊涂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以我在延安的经历，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我是70多岁时才听说这件事情的，我能有什么感慨呢？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据《三联生活周刊》